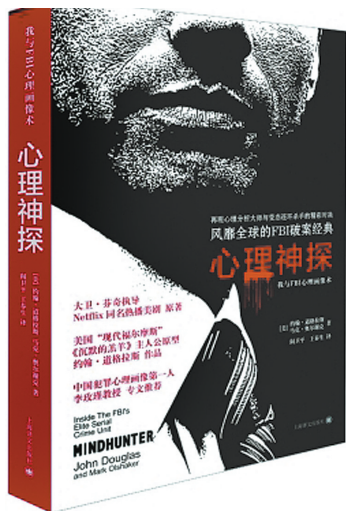


顶尖的罪犯人格画像专家认为 培育正常健全的人格是减少犯罪率的有效法宝 运用“心理画像”抓罪犯



《心理神探》
[美] 约翰·道格拉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约翰·道格拉斯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创建者之一、美国顶尖的罪犯人格画像专家和现代犯罪调查分析的开创者，被誉为“美国的现代福尔摩斯”；同时他也是著名的好莱坞大片《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的专家顾问，而且是《沉默的羔羊》中特工杰克·克劳福德的原型。他在其《心理神探》一书中，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写下了一批案件剖析，从犯罪心理角度展现系列犯罪的不同侧

面，以及运用“心理画像”技术与罪犯斗智斗勇的细节与场景，扣人心弦。

上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有一个评估：全美有几千起失踪与遇害的未破案件大概是由35名活跃的系列杀手所为。为此，FBI专门成立了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约翰·道格拉斯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较早运用“心理画像”技术进行犯罪调查分析的开拓者之一。他1970年加入FBI后，最初从事外勤工作，但在侦查犯罪、抓捕案犯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对凶手作案的思维过程更感兴趣，加之他在大学修的是工业心理学的专业，这些因素促成了他被调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

道格拉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深入监所访问已经抓捕并被判终身监禁的杀手，通过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作案动机、作案方式等。其中就包括震惊全美的埃德·肯珀连续杀害女大学生、女中学生案，曼森操纵信徒系列杀人案，理查德·斯佩克谋杀八名护士学校学生案等。截至1983年底，道格拉斯与同事完成了针对36名案犯的访谈与详尽研究，从118名受害者(大多数是妇女)身上收集了资料。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和深入细致研究这

些案件的基础上，作者结合行为科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原理，形成了“心理画像”技术，即通过对作案人员的心理特点、行为表现的分析，进而描述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形象特征，这一过程被称为“犯罪心理画像”。侦查人员获得针对嫌疑犯的“犯罪心理画像”分析后，能够在内心形成一个未知嫌疑人的心理形象，从而缩小侦查范围，使犯罪的侦破工作更有针对性，提高破案率。

道格拉斯无疑是运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侦破系列疑难凶杀案件的顶尖高手。在《心理神探》一书中，他用生动翔实的笔触，记录了亲身参与侦破的许多重大案件。比如，在托儿所老师弗朗辛·埃尔夫森被杀一案的侦破工作中，他给出的画像是：凶手是长相平平的白人男子，主要在夜间活动，住在离家发公寓楼方圆半英里范围之内，单身，没有朋友，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收藏有大量反映性奴役和性虐待的色情读物。根据这一画像，警方成功地将嫌疑犯卡迈因·卡布罗拉抓捕归案。果然，卡布罗拉就住在受害者那幢楼的4层，未婚，收藏有大量的色情读物，因患有抑郁症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这一案件的告破令约翰·道格拉斯蜚声全美，美国《今日心理学》杂志撰文称赞：“他们

把他描写得如此准确，以至于我问过联邦调查局，他们为什么不把他的电话号码也一并告诉我们。”在25年的FBI特工生涯中，道格拉斯正是使用刑事调查分析法以及“心理画像”技术，侦破了大量重大疑难凶杀案，如亚特兰大16名黑人青少年惨遭凶杀的“亚童案”、多名妓女被鲁格迷你14型猎枪猎杀案、南卡罗来纳州高三女学生莎丽被绑架凶杀案等，都是他的成功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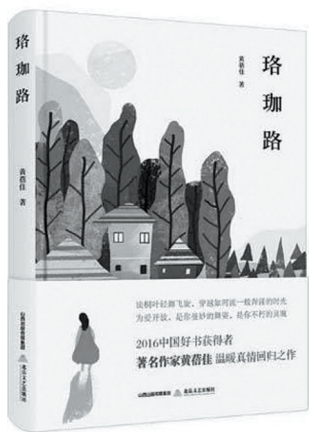
由于“心理画像”技术在犯罪侦查中屡有斩获，FBI调查支援科收到的画像请求越来越多，1979年为50个，1980年翻了一番，下一年又增加了一倍。然而，万事开头难，即使在FBI内部，最初对“心理画像”技术的看法也是朦朦胧胧，莫衷一是的，不少人视其为巫术或魔法，也有人把它看作门面装饰罢了。为此，道格拉斯与同事在开始的工作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直到1982年12月的研究报告出炉，美国各地办案人员对调查支援科的“心理画像”技术好评如潮，警方充分肯定了其在缩小嫌疑范围和突出调查工作重点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后，“心理画像”技术才真正站住了脚。

在与形形色色的杀人犯打交道的过程中，道格拉斯充分意识到，这些杀人犯或冷静缜密，或多疑狡诈，或残忍疯狂，

但往往都有很高的智商，“成功的系列杀人犯构思其行动的心理程度足以与画家相媲美。”因此，作者在成为FBI调查支援科的负责人后，时常告诫下属：“如果没有仔细研究过毕加索的油画，你就不能自诩能够理解或欣赏毕加索。”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画像师，“必须能够理清形形色色的证据和数据，同时必须设身处地地从作案者和受害者的角度进行思考。”充分了解作案者的行为个性，掌握其思维特点，是道格拉斯和他的同事运用“心理画像”技术不断侦破系列疑难重大凶杀案的前提和保障。

犯罪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造就的，这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执法部门与学术界的永恒话题，难有定论。但道格拉斯在研究和侦破各种系列凶杀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即这些罪犯的“养成”大都源自于他们有过一个异常的童年或成长经历，譬如有一个残缺畸形的家庭背景，“我从来没有碰上一个罪犯是在良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或者拥有功能齐全、体面的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是一种道德问题。它只能从道德层面上加以解决”。让人们从小在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成长，培育正常健全的人格，是减少犯罪率的有效法宝。(刘蔚)

作为“新常态”的“凝滞”中年



《珞珈路》
黄蓓佳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珞珈路》收入了黄蓓佳近些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共十篇。由于创作时间层面的贴近，这些文本大多带有即时性意味的浮世绘图景。作品涉及的丁克家庭、移民留学、微信朋友圈、股市投资、同学会等题材，同样也是众多寻常百姓家无法避免的日常问题。假如依

据这样的视角考量，《珞珈路》毫无疑问是部“动态”且在不断“刷新”的小说集。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黄蓓佳又试图通过《珞珈路》诸篇小说建立起若干“老生常谈”命题的纵深思考：寄居儿子家的寡母怎样排解内心深处孤独感(《宠物满房》)；中年夫妻/大学旧友重返故地后关于固有记忆的怀疑与重组(《布里小镇》《珞珈路》)；相处多年的夫妻为何最终会走向形同陌路的境地(《K线图》)；以及崇尚独立自主的中产阶级女性所遭遇的精神阻击(《心就是用来碎的》)。这些小说形式与内容的“错位”构成了关于此世此景的生存悖论——假如使我们生活发生倾斜的是某种定量的“内核”，那么无论怎样去“刷新”覆盖其上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无法触动最为本质的悲喜。

黄蓓佳选择将这种“错位”现象聚焦于都市社会的“支柱力量”中年群体。尽管诸如《心就是用来碎的》《布里小镇》《珞珈路》《我母亲的学生》等描述的中年男女大多拥有优渥的经济基础与体

面的社会身份，但物质层面的稳固并不能阻挡“中年”这个兼容时间与精神双重层面的词汇对于其人其身的“肆虐”。事实上，我们恰恰在这些小说里看到某种静如止水的绝望感屡屡笼罩在这些中年人身上。

《珞珈路》里多篇描述中年生活的小说都有个相互呼应的记忆起点，这些记忆起点又往往是令主人公感到难堪甚至是痛楚的切肤经历。如小说集的同名作品《珞珈路》就在两层叙事间形成现实与记忆的切换衔接：一层是“我”和大学同学鲁生重逢后驾车前往珞珈路三号的“进行时”叙述；一层则是由两人重回珞珈路三号牵扯出的“过去时”追忆，“过去时”里闪现的热闹舞会、少男少女、错综复杂的冲突误会也返照当下各色人物的生存境遇。同样的“重归故地”设置，对于《布里小镇》的“我”和丈夫来说，则联系着已故的朋友老李及其遗孀、丈夫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一段异域婚外情。而《长夜暗行》的大魏则因为新婚夜难以启齿的

生理隐疾导致其即使在很多年后于大洋彼岸获得巨额财富，也无法“清空”最初的羞耻记忆，过往的羞耻记忆又成为大魏人到中年依旧难以摆脱的精神梦魇。

黄蓓佳的小说并不以激烈夸张的戏剧技法去强化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间的冲突矛盾，相反，在“快餐化”的时代背景下，《珞珈路》这部小说集里中年人群面临的堪堪甚至痛楚的切肤经历。如《枕上的花朵》的王强和余爱华，他们两人多年后的再次相逢并未如同叙述者“我”设想的那样“充满了感慨、眼泪和震撼”，缺少转折，没有反复，即使连之后王强的“逃离”都显得那么波澜不惊。包括《布里小镇》《K线图》《心就是用来碎的》所描述的“记忆维度”与“现实维度”的强烈反差，折射的是中年群体精神世界的空洞苍白。而黄蓓佳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去叙写这些曾经充满激荡理想的人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中年“泥淖”，并逐渐沉沦于这种“凝滞”生活。

某种程度上，“刷新”时代下的“凝滞”状态成为了中年群体的一种“新常态”。所谓“凝滞”，可能发生在办公室、住宅公寓等现实空间，也可能出现在作为虚拟空间存在的各类眼花缭乱的社交平台、购物网站。无论是现实空间，抑或虚拟空间，反映的实则是中年群体对相应“空间”显出病态化的依赖与附着。就像《K线图》中的“丈夫”，他在股市这一虚拟空间里的“顺风顺水”，与其在现实世界的“不得志”形成鲜明对照。待其发展到闭门不见所有人、将所有精力“凝滞”于计算股市盈亏的疯狂地步时，则充分暴露了“丈夫”作为“现代人”本应具备的情感属性与社交能力的萎缩。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丈夫”的“退化”已不单单是“中年人”层面的症候现象，这其实延伸构成了更为普遍、也更为矛盾的现实难题：当人工智能逐渐趋近于人类(甚至是高于人类)时，相当数量的个体反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机能退化。这究竟是科技之幸？还是人类之哀？

(顾奕俊)